

读史阅世

古史新辨

# 朱熹和辛弃疾的交往

□危砖黄

## 惟一道实辈分考

□李湖江 文/图

### 这便见得他有才

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51岁,辛弃疾41岁。

这年的十二月,辛弃疾获命出任江西安抚使兼知隆兴府(南昌)。此时的朱熹已在知南康军任上干了两年,他在南康致力于保护民生、敦化风俗、整顿士风、改善文教,还复建了白鹿洞书院。当时正值冬季,江西部分地区遭遇饥荒,朱熹得知辛弃疾出任江西安抚使,便给辛弃疾写信,商讨赈灾救荒事宜。

辛弃疾接受了朱熹的建议,一到任颁布的第一道安抚令就是“禁闭籴”,严禁囤积粮食、哄抬物价,违者发配甚至问斩。《宋史·辛弃疾传》载:“时江右大饥,诏任赈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籴者配,强籴者斩。”

此前,辛弃疾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长沙)时,朱熹就很赞赏辛弃疾的才干。有一次,学生黄榦(1182年成为朱熹的女婿)在朱熹面前提到,辛弃疾在湖南颁布的赈济榜文只用了八字:“劫夺者斩,闭籴者配。”朱熹说:“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

次年九月,朱熹获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并赴临安向朝廷奏事。十一月,朱熹在赴临安的途中,经过上饶,与辛弃疾在带湖见面。当时辛弃疾还在江西安抚使任上,但他面临被弹劾(是年冬被弹劾罢职)。他在上饶带湖新建居,名之为稼轩,为退居做准备。辛弃疾富有才干,向来行事果敢,他一生曾出任多地安抚使,朝廷用他就是来“摆平”地方的。朱熹与辛弃疾的这次见面,是在辛弃疾在建的带湖新居中。匆匆一见,两人已是惺惺相惜。

淳熙九年(1182年)八月,朝廷调任朱熹为江西提刑,但朱熹请辞。九月,朱熹启程返闽,出发前他还特意写信给陆游,告知自己弃官南归。返闽途中,朱熹再次经过上饶,并与辛弃疾相见,此时辛弃疾的带湖新居还没有完全建好(稼轩落成于这年冬季)。他们一同游览了上饶的南岩,在山上论道。此次见面,两人都是“无官一身轻”了。此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 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

淳熙十四年(1187年)冬,辛弃疾和好友陈

亮曾发出邀请,邀约朱熹赴铅山鹅湖、紫溪相聚,但朱熹因事未到。辛弃疾在《贺新郎》(把酒长亭说)序中不无遗憾地说:“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

次年年初,朝廷有旨来,命朱熹入朝奏事。朱熹推辞不掉,于三月启程,途中上札再请辞,他在上饶、玉山待命滞留40多天(三月底至五月中旬)。直到权臣王淮罢相,朱熹才决意入朝奏事,五月中旬离玉山,赴浙江。其间,与辛弃疾见面,相谈甚欢,他们共同感慨:世间为人,终究要“克己复礼”。朱熹为辛弃疾的铅山书斋题写了室名“克己复礼”和“夙兴夜寐”,以此勉励辛弃疾。

朱熹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对辛弃疾的评价:“辛丈相见,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

### 山中有客帝王师

又过了四年,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二三月间,闲居上饶多年的辛弃疾(已移居上饶铅山)获命赴福建提刑。辛弃疾素有报国壮志,赋闲多年,此次赴闽任职,他是很想有所作为的。随着辛弃疾的来闽,朱熹和辛弃疾的交往迎来一个频繁期。

朱熹于前一年即绍熙二年(1191年)五月份在漳州知州任上辞职,归建阳。辛弃疾此次赴闽任职,经过建阳与朱熹晤面,故友相见,谈学论政。《朱子语类》卷132《中兴至今日人物》载:“辛幼安为闽宪,问政,答曰:‘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馭吏以严……’”朱熹为辛弃疾的履职写了贺信。六月,朱熹考亭新居落成。辛弃疾再次来到建阳,与朱熹相见,讨论经界、钞盐事。朱熹还因为助辛弃疾上疏推行经界、钞盐事的缘故,得罪于“乡人”。

此年九月,福建安抚使林枋病逝(林枋此年正月来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接替上年秋由知福州调任吏部尚书的赵汝愚),辛弃疾暂摄安抚使,并奉召入朝奏事。

第二年(绍熙四年,即1193年)正月,辛弃疾赴临安行在,经建阳考亭,与朱熹、陈亮相聚,谈学论政,把酒抒怀。辛弃疾在临安待了半年多,七八月间再奉命回福州,新的任命是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回福州的途中再建建阳,

并与朱熹共游武夷山。辛弃疾写下组诗《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

早在淳熙十年(1183年)春,朱熹在武夷山五曲大隐屏下营建武夷精舍,讲学传道。淳熙十一年(1184年)二月,朱熹与友人学子共游武夷九曲溪,写下《武夷棹歌》十首。辛弃疾早知朱熹作《武夷棹歌》(又称《九曲棹歌》),所以他游武夷时亦作《棹歌》(十首)“呈晦翁”。

朱熹的《武夷棹歌》是溯游而上,从一曲写到九曲,渐次写来,有如展开一幅山水画卷。辛弃疾的《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则是印象为先,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写意恣肆,把人的情态、思绪赋予山水。诗中有句云:“游人去后枫林夜,月满空山可奈何?”仿佛辛弃疾已经化作一片枫叶,在月夜里体会空山的寂寞。诗中又有句云:“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这是辛弃疾在直接表达对朱熹的赞扬和羡慕。

辛弃疾回到福州约一个月后,即绍熙四年(1193年)的九月,朱熹致信福建漕司,谈对盐法的意见,劝辛弃疾“罢黜盐”,辛弃疾听了朱熹的建议,停止私盐买卖。

公务之余,辛弃疾没忘记九月十五日是朱熹的生日,他给朱熹写诗祝寿,即《寿朱晦翁》(二首),其一:“西风卷尽护霜云,碧玉壶天月色新。风历半干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其二:“玉漏声沉晓色回,五云绚彩映庭槐。持巾珠履称贺,飞鞚貂裘押赐来。黄菊尚迟三日约,碧桃已作十分开。洞天春色非人世,不记银河第几回。”

有的版本把《寿朱晦翁》写作《寿朱文公》,那应是后人所加,朱熹生前并无“文公”之称。诗中“护霜云”有版本作“护霜霄”。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辛弃疾当时就认识到朱熹思想的价值,给予朱熹极高的评价。

### 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绍熙四年(1193年)十一月,由于宰相留正、赵汝愚的举荐,朝廷命朱熹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抚使。朱熹请辞两次,均未获批准,只好于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中旬启程赴潭州任。

朱熹在请辞待命期间,曾致书福州州学教

授常潘泂,助辛弃疾、常潘泂修建、整顿州学。常潘泂字郑卿,常同之孙,绍熙四年来任福州州学教授,依照辛弃疾的意图,大力整顿州学。朱熹作《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大加夸赞:“福州府学,在东南为最盛……绍熙四年,今教授临邛常君泂始至,既日进诸生而告之以古昔圣贤教学之意,又为之飭厨饌,葺斋馆,以宁其居。然后谨其出入之防,严其试课之法。朝夕其间,训诱不倦。于是学者兢劝,始知常君之为吾师;而常君之视诸生亦闲闲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进于学也……”

五月,朱熹至潭州。交割职事之后,朱熹做了一件事:申请飞虎军隶本州节制。此事得到朝廷批准。湖南飞虎军还是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时创建的,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地方劲旅,有史料说飞虎军创建后,40年间保地方安定稳定。《朱文公文集》卷21《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说:“熹窃见荆湖南路安抚司飞虎军元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本为弹压湖南盗贼,专隶本路帅司……今乃遥隶襄阳。襄阳乃为控制北边大敌,自有大军万数,何籍此军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余里……特赐敷奏,别降指挥,仍旧以湖南飞虎军为额,其升差节制一切事务,并委帅臣专制。”

十多年前,辛弃疾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他的作为和才干,让朱熹钦佩和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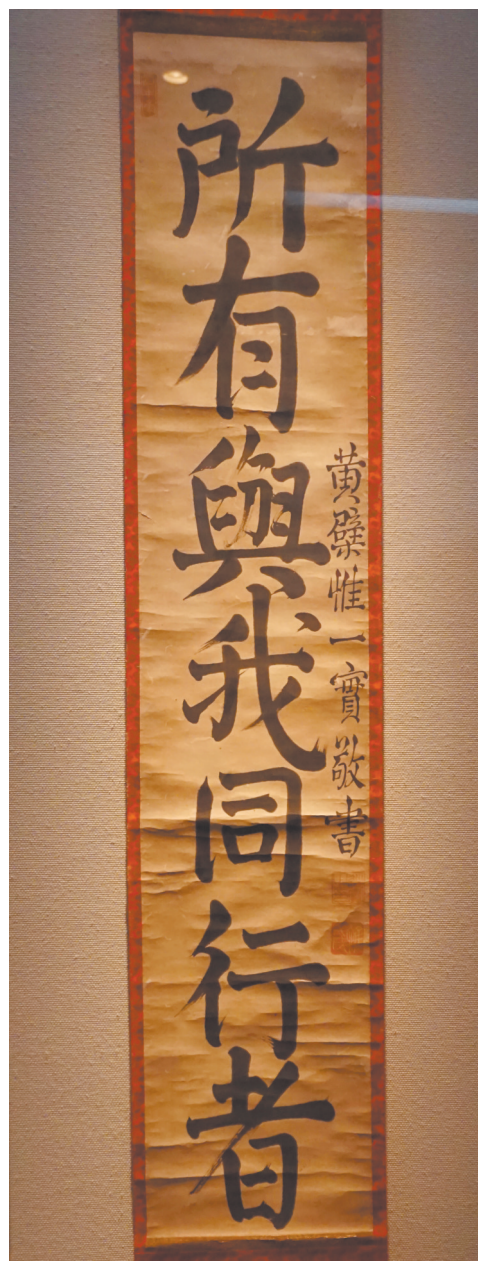
辛弃疾在福建也想组建一支能战斗的劲旅,就像他在湖南创建飞虎军那样。他厉行节约,储备财力,准备打造万副铠甲,招募士兵,训练一支有战力的部队。他效朱熹“社仓”之法,在福建建“保安库”。但最终没有成功,被弹劾,罢闽帅。《宋史》上说:“末期岁,积糴至五十万缗,榜曰保安库。”“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则盗贼可以无虞。事未行。”

“事未行”,就是说这事遭到阻挠,乃至弹劾,寸步难行。

朱熹到潭州不久,绍熙五年的七月,辛弃疾就因遭弹劾罢职,无奈地离闽退居了。从此两人再无相见。

宋宁宗庆元元年,朱熹被指为“伪学之魁”,遭到打压,辛弃疾不以为意。

朱熹逝世的前一年(庆元五年,即1199年)冬,写一封手札给辛弃疾,以“克己复礼”四字相勉。朱熹逝世后,辛弃疾为之痛哭,在祭文中写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惟一道实书法

在高泉性激著《一滴草》第四卷文集中,收录了一篇较为罕见的人物传记《华严道实传》,虽然不足千字,但概述了惟一道实禅师(1620—1692年)的生平履历,而且是关于惟一道实最完整的记载,比日本悦心《黄檗东渡僧传》中的记录要详细。

惟一道实的户籍在福州府侯官县,系将门之后,父亲郑东里(希桥),母亲徐玉官。《华严道实传》记载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惟一将要出生的时候,父亲与同僚在船上捕鱼,不知弄璋弄瓦,就撒网对天祈祷:“果弄璋当得一鲤。”果然有一条大鲤鱼入网,于是为儿子取名兆鲤。郑兆鲤十七岁的时候,母亲得病难愈,他以自己的股肉为药,孝心传遍乡里,十九岁时娶妻生子,不久妻、子相继离世,于是在南明隆武帝入伍,官至参军,后因父亲死于兵难而出家。

《华严道实传》中有这样一句值得注意:“特指黄檗普照国师剪落,礼独往幽公为依止,时年踰而立矣。”惟一道实的剃度师是“普照国师”即隐元隆琦禅师,但是他的依止师是独往性幽,独往性幽的生卒年不详,系福建福州府三山人,俗名欧全甫,隐元法嗣,曾编《狮子岩志》《黄檗山志》,也就是说惟一道实的嗣法师应该是独往性幽。日本文献黄檗宗布教师汇编《黄檗宗大本山万福寺历代住持集》将其嗣法师误作隐元隆琦,这样就差了一个辈分。

惟一道实实际上是隐元的法孙而非弟子,这可以找到有力的旁证。证据一:隐元弟子即非如一禅师称惟一道实为禅侄。(《非禅师全录》中有《答惟一禅侄》《次惟一禅侄韵》《赠惟一禅侄书》《华严》)等诗。证据二:隐元法孙干呆性安称惟一道实为禅侄。在《干呆禅师语录》中有干呆性安赠给惟一道实的诗偈,题为《惟一禅侄书诸大乘经圆满,述偈以赠》。所以,惟一道实为隐元禅师的法孙应当确定无疑。之所以造成误解,客观原因是资料的匮乏,另一方面主观原因,可能是惟一道实剃度之时已过而立之年,年龄偏大导致后人错误辈分。

1661年,为庆祝隐元禅师的七十大寿,高泉性激奉师命东渡日本,惟一道实同行,这应该就是他第二次东渡,不久惟一道实成为隐元禅师的侍者。《国学研究》2020年第3期倪霞译《山田玉田黄檗祖师巡拜记》一文,记载了惟一道实先后两次东渡,以及这两次东渡的间隔期在海南镇海寺发生的故事:“惟一道实禅师因在日本黄檗寺的西方上的双鹤亭里用书写了《华严》《法华》《报恩》《涅槃》等多卷经书而闻名。他自号华严道人,在双鹤亭的旁边建了个院子,称其为华严院,但这个地方如今已不存在了。他为辅佐‘国师’(清)顺治甲午(1654年)东渡到了日本,但第二年便回到了中国的黄檗寺,下一年又寓居在了海南眠牛山镇海寺,之后又与高泉和尚一同到了日本。他在镇海寺的时候,赤脚露顶,唱诵《华严经》日课千拜,一日也未荒废。有一天贼船来袭,当地和尚劝他快躲一躲,但他没有听从,回答道:‘我一贫僧,一无所有,若要我取性命,拿去便是!’之后便像往常一般大声诵读《华严经》。不久后黑风忽起,砂砾飞舞,树木拔起,贼船不见踪影,由此人人都愈发敬佩禅师的伟德。”当然,这是属于僧传中的“神异叙事”。

惟一道实禅师最令其师友称道的事件是血书五大部经。血书佛经是佛教界中一种特殊的弘法方式,是对佛教极其虔诚的表现,被佛教界认为功德不可思议,如近代弘一大师曾血书《华严经》《四分律行事钞》等。惟一道实从1661年春天开始,游指血书《华严经》八十一卷,计597317字,历时三载完成,之后又血书《法华经》《报恩经》《金光明经》《涅槃经》,于1667年冬天宣告圆满结束,即非禅师感动于此,曾作诗《题血书五大部经》称赞惟一道实禅师。

# 闽东传统建筑上的悬鱼

□吴卫 谢美晨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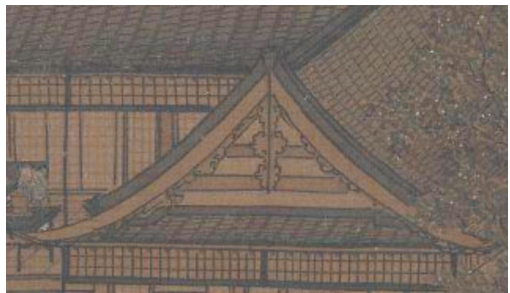
便如此,在现存唐代壁画里所描绘的建筑上,悬鱼的形象也是偶见,应该反映了在这些建筑上悬鱼的使用也并未得到普及。

进入宋代,悬鱼方才逐渐流行于官民建筑。在流传至今的两宋时期绘画,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梁楷的《耕织图卷》等作品中常常可见到。当时使用悬鱼的建筑不论是歇山顶或是悬山顶,其类型基本上是宫殿、楼阁,以及官员士大夫的府邸;普通民居建筑则鲜见有使用悬鱼,反映了宋代仍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唐代对悬鱼使用的约束。

从元代起,悬鱼在官民建筑中逐渐消失,其彰显社会地位的功能也不复存在。但在闽东地区的福安市及其周边的蕉城、屏南、寿宁等地明清时期的传统建筑上却仍然保留着使用



唐代悬鱼



宋代绘画中的悬鱼

悬鱼的传统。闽东地区的悬鱼皆为木制,以杉木最为常见,也有部分采用樟木。北宋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中对悬鱼的形制规定为:“或用华瓣,或用云头造,长三尺至一丈……其广厚皆取每尺之长,积而为法。”“每长一尺,则广六寸,厚二分五厘。”从现存的绘画资料来看,唐宋时期的悬鱼大部分是由左右对称的两块木板拼合而成,素面或雕饰卷云纹。相较之下,闽东传统建筑的悬鱼在结构和图案装饰上较前者都有了较大的变化。

从结构上看,闽东传统建筑的悬鱼采用的是一整块的木板制作,呈长条形。悬鱼的装饰构图也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称为钉板,往往雕有八卦、太极或卍字图样,有驱邪镇宅的用意。下部称为鱼板,典型图案为一对鲤鱼尾部交叉,并从口中共同吐出一朵莲花。在当地的传统文化中,鱼板的形象有多重的寓意,如多子多孙、连年有余等;又由于鱼在五行业中属水,所以鱼板的图案还有压火的目的。

中部称为字板,多以卷草或缠枝花卉纹作长方形边框,框内阳刻若干文字于上,内涵丰富,极有意味,也是悬鱼最值得玩味的部分。这些文字多引自《诗经》《易经》等古典文献,也有借用名人典故、名词佳句、民俗信仰等,多为四字一句,偶有三字或五字。这些文字的立意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类:

其一,避祸消灾。传统木结构的建筑,火灾是大患。因此,除了在天井内设置水缸外,还会采用一些象征性的避火装饰,譬如鳌鱼形象的雀脊、螭吻等,实际上是取五行中水能克火之寓意。在木悬鱼使用的文字中也往往有这个功能。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表达就是一个“水”字。此外还有引用《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两面山墙的悬鱼各取半句。但“三光水”则是例外,它并非为避火灾。三光水是道教神话中的“三光神水”,即日光神水、月光神水和星光神水,三者合一后能克毒疗伤,起死回生。所以,“三光水”字样应是避瘟疫之意。

其二,祈求吉祥。常见既有朴实直白的“增福寿”等字样,也有稍带婉转的“紫气东来”或“东来紫气”。也有不少以“云”代替“紫气”象征祥瑞的吉语,如“云呈瑞彩”“西曜祥云”“彤云焕



闽东民居的悬鱼

### 乡土谈记

悬鱼,又称作垂鱼,是歇山式和歇山式传统建筑屋面部分的一种构件。在北宋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第八卷“小木作制度二”的“垂鱼、惹草”一节有云:“凡垂鱼施之于屋山博风板合尖之上。”可见悬鱼是悬挂在房屋山面的博风板交接处,其功能是遮挡交接处的缝隙,加强博风板的强度。

关于悬鱼出现的确切年代似已难考。在《后汉书·羊续传》中,提及羊续任南阳太守时为官清廉,将下属馈赠之生鱼悬挂于院内屋檐下,以示谢绝。因此,后人也将悬鱼赋予了清廉的寓意。在东汉时期的画像砖上会看到在建筑的屋檐两端各悬挂一尾鱼的图案,这应当就是悬鱼最早的形象,但显然此时的悬鱼更像是檐下的装饰物。

悬鱼作为博风板上的构件最晚在唐代前期就已出现。在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颁布的《营缮令》中规定,“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普通椽梁装饰”,即悬鱼仅在宫殿、寺庙和高级官员的宅第方可使用。即